

惊

鸿

一

瞥

惊鸿一瞥

文学中国：1949—1999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写

杨匡汉 主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

惊



瞥

文学中国
1949—1999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写

杨匡汉 主编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鸿一瞥：文学中国：1949~1999/杨匡汉主编. -西安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. 1999

ISBN 7-5419-7711-X

I. 惊… II. 杨… III. 文学史-中国-当代 IV. I20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0788号

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375印张 6插页 370千字

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-5000

定价：23.50元

读者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：南郊丁家村 邮编：710065 电话：(029)8227031

目 录

开 篇 一座悲烈而富有的精神博物馆

- 1 特殊的文学阶段 1
- 2 新的文学形态的胜利 6
- 3 实践中失落的和获得的 9
- 4 两个世纪末：三次文学“改道” 16

第一章 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

- 1 岁月与河山 23
- 2 乌托邦的命运 30
- 3 历史的再现与重构 36
- 4 青春的吊诡 41
- 5 并不遥远的地平线 45

第二章 从五十年代烟云到红高粱家族

- 1 在和平的日子里 49
- 2 穿越历史现实 56
- 3 生命体验千堆雪 61
- 4 艰难分享与倾诉 72
- 5 “蝴蝶”效应 75

第三章 立体交叉桥上的剪影

- 1 选择与改造小说资源 84
- 2 “故事”与“抒情” 99
- 3 非情节化·先锋·90年代短篇 111

第四章 从早春情调到混声合唱

- 1 诗歌的“欢乐王国” 125
- 2 冲破严冬阴霾的春燕 136
- 3 美丽和不美丽的混乱 147
- 4 走向边缘的诗神 153

第五章 竖穷三际 横亘十方

- 1 马鞍型的轨迹 162
- 2 模式的建立和盲点 172
- 3 太阳对着散文笑 177
- 4 繁华与贫困 189

第六章 时代琴弦上的搏动与变奏

- 1 在赞美和咏叹中收获 196
- 2 热血悲歌 211
- 3 星光灿烂的时候 214
- 4 从历史的沉思到改革的锣鼓 218
- 5 在理性审视中伸展触角 228

第七章 从“铁姑娘”到“真女人”

- 1 女英雄模式的出现与性别的泯灭 239
- 2 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 246

- 3 女性书写的期待与限度 252

第八章 洒向人间的童声与爱心

- 1 塑造民族灵魂的雕刻刀 271
2 诗性之光与游戏精神 285
3 飞翔的天堂鸟 297

第九章 从营造圣殿到走出圣殿

- 1 使命的神圣使自身神圣起来 309
2 理想光环与真实细节的组合 315
3 旧创作模式的惯性延伸 325
4 “神”与“人”的拉拔 328
5 走向平民化 332

第十章 银幕上的纤夫之曲

- 1 电影纤夫的领头人 339
2 边牵“牛鼻子”边吆喝的“老牛倌” 346
3 从小桥流水到大河奔流 351
4 万吨巨轮航行在银海上 357
5 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365

第十一章 升起在山林草原上的云霞

- 1 一唱雄鸡天下白 371
2 骏马从四野八方驰来 380
3 永不褪色的相册 392
4 民族舞台上的绮丽风光 400

第十二章 突破层云依然有灿烂的阳光

- 1 理论批评的“一体化”进程 409
- 2 “文学的自觉” 421
- 3 世纪之交的突围表演 427

第十三章 在历史的滴血处各领风骚

- 1 与生俱来的现实品格 437
- 2 历史朝阳中的辛勤耕耘者 442
- 3 现实困惑中的真诚思考者 451
- 4 社会喧嚣中的热情评说者 458
- 5 多元世态中的边缘写作者 470

结 语 道路伸向远方 477

后 记 482

开篇 一座悲烈而富有的精神博物馆

一声汽笛划开十月的黎明。迎着彩霞飞行的鸽群，抖动翅膀，向黄河、长江、北疆、南海送去节日的问候。五千年久远的沧桑，五十个奋斗的春秋，枫叶和菊花装扮了今天成熟的季节。岁月赋予纪念碑以庄重与前进的意义，曩昔烟云的悲烈，已化为灯火的温暖。在我们人民共和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所有的繁华与昌盛，无不来自步履的坚定和热血的灌溉。

人们常说：笔纵生花谁惜取，随他梦逐天涯去。然而，文学作为精神的花环，作为心灵的搏动，毕竟是在现实社会人生中盘旋的缠绵之思。蘸有心智和血汗的文学，在共和国五十年间，为我们的文化故土平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。惊鸿一瞥，那就让我们走进文苑，看看各路景色，看看它的历史命运和特殊经验，看看中国作家们如何化泥聚芳魂的种种争取。

I 特殊的文学阶段

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，已有八十年的历史。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，前三十年是一个大阶段，后五十年又是一个大阶段。一般指称前一阶段为现代文学，后一阶段为当代文学。这两个大阶段，又可按不同的切割，作更为具体的划分。但这前后两

个阶段的划分，已约定俗成，并无太多争议。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，始于1949年而无限延长的当代文学的命名，近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。这一问题的解决，只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，当然也有学界同人重新约定和认同的问题。我们仍然沿用目前通用的“当代文学”的说法，而且仍然遵从以1949年为这一阶段文学的起点的惯例。

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。以这一年为标志，中国的政局有了巨大的变化。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政治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——在很多时候是，政治“运动”文学，文学“配合”政治——所以，这种政局的变化对于文学的影响，几乎就是决定性的。何况，以往呈整体状态的文学，也是以这一年份为标志，开始了以台湾海峡为分界的同一文化母体的一体异向的发展。两岸三地的文学从此开始了历时数十年的既彼此分割、又相互补充、相互辉映的历史性时期。这也是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的。

这一阶段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，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变革的特殊文学阶段。一方面是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传统得到延续，另一方面，则是这一文学的若干品质产生了大的变异，原来的文学取向有了重大的改变。由此生发出有异于前的文学新质，它无疑是对新文学历史的一次改写，同时又以它的特质给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的经验。这些文学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文学的内容有了新的拓展，即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大量地涌进文学。当然，与此同时，更多的旧的生活和旧的人物也退出了文学。在这一进一退之间，文学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。

中国当代文学直接承继了近代以来文学强国新民的传统。中国几代的社会精英，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，四方求索而救国无门。当军事上连连败绩而实业救国或洋务运动等又无以奏效

的时候，文学则成了他们实现强国新民理想的重要选择。这些先进的知识者认为，强国在于新民，新民必先铸魂，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和各种文章则是唤醒民众的可行方式。由此可见当时文学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。

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，中国作家想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全面革新的努力，使之有效地接近民众、并为民众所接受。这正是使文学有益于改造民众这一思路的延展。由此，我们看到了从新文学革命开始的“为人生”，到后来的“为救亡”、“为国防”、“为政治”以及每一个时期都有的“为……”的号召、主张和实践，其中的用意也正在于使文学能够和社会的发展、民主的建设结合起来。

这些因素，自然地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的理念。文学尽管有多种功能，但“文为世用”的观念，却是中国人自古而有。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，也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。而把这种“有用”的文学观念加以改造、并大面积地移用于政治的动机、并使政治最后支配了文学，则以中国当代文学为极致。早在抗战结束之后的国内战争时期，即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想出现。所谓“工农兵”，工人及士兵都来自农民，其中心则是农民。中国以农立国，当年战争的主力是农民，广大的根据地也在农村，把文学发展的基点放置于农村，则是社会情势之必然。

从农村进入城市，从根据地转向全中国，胜利者把赢得胜利的经验，带到了建设新的生活之中，其中也包括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文学经验，并把这种文学经验上升为中国文学的方向。1949年7月5日，新中国成立的前夜，在第一次文代会上，周扬作《新的人民的文艺》的报告，其中说：“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，并以自己的全

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，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，如果有，那就是错误的方向。”周扬用不容讨论的坚定的语气来说这番话，这番话决非随意而为。1949年以后的全部事实，证明中国文艺正是按照他所表达的路线和方向来进行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学社会功利主义在当代的强化。

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。不仅是由于新建立的政权的行政力量坚强有力，以及决心的坚定，而且，还由于在这一经验的背后，是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习惯和趣味，特别是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文明和农民文化。以往在局部地区实行的文艺方针，如今要使之推行于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。这一巨大工程是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计划社会的理想相联系的。

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农业国，农民——地主创造了田园式的乡村文化，它成为主导式的文化形态。在中国都市知识分子是先天力量单薄，它没有根。这些知识分子，他们或者本身就出身于乡村，即使来自中小城市的，他们的根底还是乡村。他们是从那些地方走进大城市，并经由诸如上海、北京这样的城市走向西方。他们为中国引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火种，用以烛照封建中国的暗夜。这些受到西方熏陶的知识分子，可以在特定的时代（例如五四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，但在通常时期，他们则始终被乡土中国文化所包围。

这不仅表现在内地，也表现在战争时期的延安。正是由于严重的两种文化冲突，导致了40年代初著名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发表。当民众（包括军队及其干部）只能享受低级的农村文化时，在那里引进并演出《大雷雨》或曹禺的作品就是乖谬的。许多文艺的悲剧由此产生。50年代围绕《我们夫妇之间》的争论和批判，其实也就是乡村和都市的文

化冲突的外现。这种文化冲突的思想，在韦君宜的《露莎的路》中也有涉及。“亭子间”里的大小知识分子，把他们的趣味和习惯带到了延安的窑洞，这不仅在当时，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荒唐的。

围绕着文学各个品种之间展开的讨论，看似复杂，究其因，说透了都要追溯到这个根本上来。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，在中国，往往体现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。从这个角度来考察，长期争执不休的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，以及80年代关于“朦胧诗”问题的讨论，不论是主张格律体反对自由体、还是主张明朗反对晦涩，既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的体现，也是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的体现。

由于战争实践的胜利的鼓舞，农民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强化。它摇撼了本来就很脆弱的都市知识分子意识。它改变了五四所形成的以都市文明为主导的运动方向，毫无疑问，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乡村文明，正以其巨大的覆盖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格局。从本世纪中叶开始，对全体知识分子实行的思想改造运动，说到底也就是乡村文明对于都市文明的占领。

政治的统一自不必说了，经济上也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，即把原先多种形态的经济，改造为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，工厂、农村、商业和手工业都如此。至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“统一”，其中最复杂和最麻烦的，则是文学艺术。因为文学的生产是个别的，是和每个作家的个人经历、个性、修养以及审美趣味相联系的。一个作家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作家总是以独特的思想、飞跃的想像、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来获得创作成功。这样，整个文艺创作就面临着严重的局面，即“个人”与“集体”的矛盾，文学一体化的工程困难重重。把形形色色的、多种多样的作家改造成单一构成的

作家，这看来像是一个神话，但还是在坚定的号令下展开了。至于改造的标准，已非常明确，那就是用农村和农民的标准在广大的精神领域，对非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方法进行改造的大工程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学阶段。文学以空前的魄力和持久的坚持，推进它的一体化理想。它为自己设置了很高的目标，寻求一种理想式的倾斜，建立一种前无古人的文学模式。每一次政治批判或文学批判（尽管各个时期的提法和内容均有变化），都旨在把全部作家的实践（从内容到形式）推向它所规定的方向。

2 新的文学形态的胜利

文学的统一化尽管带来了一些弊端，但事实也不全是暗淡的。一批在新形势下得心应手的作家，他们取得了成功。赵树理无疑是这个文学时代的骄傲。他以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故事，取得了自有现代文学以来表现中国农民的最高成就。赵树理创造了生动、切实的农民形象，他成为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中国农村的圣手。他是个集大成者。赵树理在实践新文学的新方向方面，取得了他人无法企及的成功。也许由于他本身就是农民，他深知中国的黄土地上辛苦耕作的人们。所以，不是不可以写工农兵，也不是文学不可以以农民为中心，而是不必让所有的人都放下他们熟悉的人物和故事，去写他们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。在赵树理那里是成功，而在别的人那里可能就是失败。

这个理论的倡导显然在一些作家那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

中国新文学中有所谓“乡土派”的写作，这些作家在表现中国农村方面做出了贡献。鲁迅通过他儿时的乡村经验的再现，表达了甜蜜而苦涩的乡情，以及中国大地的积重。更多的现代作家都在“为人生”的旗帜下，传达了广大的中国乡村的哀愁。但这些作家由于明显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局限，他们在表现中国农村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，都远不及自 40 年代起坚持“工农兵方向”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家。

在这一批作家那里，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不是空泛的，而是一个一个切实的行动。值得提及的作家还有孙犁、柳青、以及“山药蛋派”的作家们。他们创造了一批战胜苦难、争取新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。《红旗谱》中的朱老忠的反抗性格，遥远地接连着《水浒》英雄们“替天行道”的功业。《小二黑结婚》里的人物让我们依稀看到鲁迅《故乡》中的人物的影子。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心是相通的，这里看不到“代言者”，也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旁观的“悯农”的痕迹。他们是一同站立在大地上共享悲欢的兄弟。他们是真诚地感受到中国黄土地的苦难和欢乐的作家。孙犁的《山地回忆》、《荷花淀》飘散着北方大地诗意的芳香，尽管他表达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年代。

中国当代文学由于致力于推进工农兵方向，因而在表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方面，做出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贡献。回顾五四以来的文学，由于发动和支持那场文学革命的是城市知识分子，他们中的中坚分子多是留学外洋受到良好的西方教育。他们中虽然有不少来自农村，但由于那时的兴奋点不在农村，而旨在“以洋为师”，借引进西方的观念和经验以改造中国的旧文学。因而，对那些人来说，尽管他们也许了解农村并同情农民的命运，但也可说是所知有限，表现既不广泛也难有深度。显然，有更为迫切的目的吸引着他们关注的

目光。

40年代初文艺座谈会以后，直至进入50年代，那种忽略农村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有力的号召，再加上认真的实践，造成了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文学表现农村和农民的高潮期。在这个高潮中涌现出堪称农村圣手的赵树理，他的名字和那些成就卓著的大师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也毫不逊色。文学史总是一种独特性的加入，赵树理创造了文学的乡土中国的经典性的业绩。农民式的机智和幽默，对中国农村穿透性的洞察力，以及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，赵树理的作品散发着来自中国大地的香喷喷的“土气”。这一切，都使他在新文学史中具有了他人无法替代的、独特的意义。除了赵树理以外，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在这一方向的引导下，向现代文学的积存提供了一批有异于前的、同样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。小说如《红旗谱》、《荷花淀》、《创业史》，诗歌如《漳河水》以及民间歌手如王老九的歌谣等，都为文学增添了新气象。

中国文学确实在新时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。原先成分复杂的作家和艺术家都面临着必须告别过去、迎接新生的极为艰巨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形势。中国文学正在坚决地按照统一化的计划，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调整。这种调整的内容是全面的，即不仅在大的方向上必须一致，而且在到达这一目标的方式上也是规定好的，例如作家必须深入到“火热的斗争”中去熟悉原先陌生的生活中的人和事，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，以及建立生活根据地等等。对于文学的创作，从内容到形式也无不有一致的，即使不能也要大体一致的要求，例如要写“英雄人物”以及不可写“中间人物”的要求；作品的情调必须明朗不可低沉的要求；艺术形式的大众化——民族化的要求等。

不间断的政治的和文学的批判运动，虽然各个阶段有各不相同的指称，但大体都针对作家创作有悖于统一化战略的错误

的、“不正确”的、甚至“反动”的倾向，旨在纠正这些倾向而开展的斗争。这种批判运动的开展，造成了大批作家的“流失”，以及某一时期、某一阶段文学的单一甚至枯竭的后果。中国曾经有过若干个文学极端一律化的时期，例如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时期，尤以后者最为突出。“样板化”就是最极限的例子，而样板化的结果则是文学的空前萧条。

我们的文学是从“文革”的极限和绝境中走出来的，正是开放的社会给了文学以新的生命。由此，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认知，即我们已经认识到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，已从计划的经济和单一的经济的实行中得到深刻的教训，我们于是决心改变这一状况。而计划的文学和单一的文学实行的结果，虽不如经济那般直接地影响于国计民生——因为它并不直接关涉到人民的“穿衣吃饭”，文学是“可有可无”的；然而，这种对于文学破坏性的结果对于社会的影响，则是更为深远的。它造成几代人的精神贫困，当文学变得枯竭时，人们的情感也会因枯竭而变异。

3 实践中失落的和获得的

中国新文学诞生不久，当时的文学探求者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众多的外来理论，以为自己的创作指针。《新青年》杂志一开始就致力于新理论的介绍，这种介绍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作家的视野。中国作家由于文学的强国新民的理想的支持，从新文学的试验期开始就把文学表现的镜头，对准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：严重的贫富对立，人力车夫在寒风中的挣扎，都在当时的诗和小说中得到表现。

中国作家一开始就很注重写实派的文学主张。文学研究会的成立，以及他们“为人生”的创作主张和实践，可以说是受到了这一文学思想的很大的影响。文学和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态、和他们的苦痛和希望紧密地联系了起来。至于鲁迅早期的小说，简直就是中国人平常生活的人生百图。鲁迅一开始就把批评现实的视点，对准了中国人的灵魂。开端即是顶点，他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写实主义的文学在当时人的心目中，无疑是一件珍宝，它能把现实生活的实际图画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出来。早期的新文学作家，从这种文学和社会的直接而神秘的关系中，觉察到它的价值——他们本来就追求以文学改造民心进而改造社会，本来就追求文学“有用”。写实主义在此时的出现，恰恰是与多数中国作家的追求相吻合。

后来，苏俄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文学思想传了进来。这些理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性，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，以及作家的社会使命感。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文学产生于劳动的基础之上的，劳动创造人类，劳动也创造文学。这种理论极易于与当日中国新兴的激进社会理想相结合。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，由于饱经忧患，时刻都在寻找疗救中国的药方，很少不受到上述这种新进思想的感染和影响的。

30年代的中国是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。由于左翼文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，以这种文学理念为基础的、注重文学社会性的思潮于是陡然兴起。新进的社会思潮与革命的文学理念，几乎是一拍即合，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从新文学运动初期的“为人生”，到后来广泛流行的“为政治”，几乎就是一步的跨越。

当代文学由于直接承继了解放区文学的传统，那些与这一